



故乡

gu

道上

guxiangdaoshang

● 杜应国 ● 著



故乡情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

故乡

gu

道上

guxiaogdaoshang

● 杜应国 ●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乡道上/杜应国著. —贵阳:贵州教育出版社,

2008.2

ISBN 978-7-80650-914-2

I. 故… II. 杜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2155 号

故乡道上

杜应国 著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

(电话 8654672 邮编 550004)

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字数 10 印张 225 千字

版次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650-914-2/I·48 定价:23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新添大道测绘院 电话:6300007 邮编:550018

关于贵州，关于贵州这块土地上的人，关于这些人的生活，关于这种生活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是一个很大的，还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。

请一些人来写写他们和贵州的事，写写他们对贵州这块土地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情感，写写他们在贵州曾经的生活和正在的生活，让人们看到他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悲欢离合的人生命运，酸甜苦辣的心路历程，折射出这块土地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发展，由此看到时代风云的深刻痕迹，领会“我”与贵州之间的共生关系。这就是“我的贵州”丛书设想。

本丛书是开放式的：作者应该拥有广泛性，内容更应该具有广泛性。只要有真实的记录，真挚的情感，真切的思考，就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。众多的人将自己丰富的生活和情感经历，叠印在莽莽群山的背景之上，那会是一幅壮美多彩的人文画卷。

出版者语

目 录

CONTENTS

辑一：逝水有痕

- 1 我的故家
- 11 泥土上的记忆
- 14 朝门深处
- 21 课堂内外
- 30 风云乍起
- 40 回忆大串联
- 54 曾记当年“剪一丁”
- 57 知青岁月
- 73 青春的歌哭
- 76 殇祭——写给一个默默无闻的生者与逝者
- 96 剪不断的思恋

辑二：故土故人

- 116 地缘与人缘
- 129 黔中石说
- 135 书店：留在记忆中的影像
- 142 张学良在贵州
- 145 戴安澜将军的安顺缘
- 152 黄元操与安顺一中
- 156 谷氏大出殡
- 160 “五四”老人伍绛霄

目 录

- 165 难以湮灭的足迹
172 生命的苦旅
176 蒋旭英:留住一段消失的风景
181 灵魂雕塑者的重量
186 德惠业 光照人
190 一蓑烟雨任平生——岳母刘玉珍记
194 此情可待成追忆
198 消隐的歌者
209 却话巴山夜雨时
212 幺哥陈启基的石门缘

辑三:黔山夜语

- 217 黔中道上
227 灰皮书、黄皮书
231 关于《读书郎》的两条材料
235 地方史的文化蕴含
238 “破题”之后——也谈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
244 镜像与素描——戴明贤《一个人的安顺》读后
253 心灵的拷问与追寻——一个“幸存者”的精神之旅
276 精神的苦难与张力——宋茨林《庙与学校》读后
284 黔境山水第一人
293 理性的声音——汪小川《二铺调查》四十五周年祭

辑一：逝水有痕

我的故家

我的老家木当寨，是个典型的小山村，位于安顺正北面，距城不过二十余里。村子坐落于两座小山脚下，山虽不高，却长满了茂密的树丛，乡人呼之为“箐坡”。两个箐坡，一左一右，相距不过百米之遥。依山筑建的房屋，毗连成片，分列山脚，自左而右，有上苑、下苑之称。村前不远有条小河，曲曲弯弯，环村而过，犹如一条闪亮的飘带。村口水塘横陈，虽方圆不过数丈，却歪斜着几棵粗大的柳树，枝条婀娜，轻拂水面，颇添几分景致。柳树而外，沿岸塘边还砌有半围青石条，供人闲坐纳凉。每逢夏日的黄昏、夜晚，塘边总坐满了人，大人孩子，凑着那一根根闪亮发红的烟袋，陈年旧事与往古传说一并在“叭哒”声中讲叙。上苑寨门边，一棵百年古柏，苍翠挺拔，直耸云天，俨然已成为这村寨的标志。只是如今，古柏已被人砍去，塘边的柳树也硕果仅存，只剩

孤零零的一株半朽老树了。

这寨子很小,仅四、五十户人家,分着谢、赵、张、杜几大姓。其中,我们杜氏家族就几乎占了一半,不过都很穷。1949年以后划成分,村中唯一的地主是户赵姓,他家有多少田地不得而知,但他家留下的一座碉楼却保存至今。过去,碉楼一直作为生产队的仓房,如今集体不存,那碉楼早已废弃无用,只剩一个空壳虚有其表地立在那里了。

不过,说起来这木当寨却也不是我们杜家的世居地。杜家最早的大本营,是距之约十来里地的“官旗山”,位于北门青山附近。依明兵制,“旗”是最小的军事单位,分总旗和小旗,总旗50人,小旗10人,每百户所辖两总旗。由此推想,那“官旗”之地,或许也是当年一个小小的军屯之所亦未可知。官旗山的祖茔葬有我们杜氏家族的入黔始祖,称“一世祖”。这位一世祖,家谱上的名字作杜兴龙,而墓碑上刻的却是杜鹤龄,谁也说不清是何缘故。而且,据说此墓原葬于安顺北郊的野毛井,是族人们后来将之迁至官旗山的。照家族里的说法,我们的一世祖,当年还是朱洪武征南大军的十八路指挥使之一。安顺谣谚:李杜蒋许葛范张,南北左右西五王,丁殷庄娄与黄马,十八指挥定黔阳。其中确有杜姓不假。我也曾见过那墓碑,碑上确有“明威将军”的字样也不假。碑额“皇明始祖”四字,下刻“考明威将军杜公鹤龄、妣杜太恭人蒋氏墓”。“太恭人”是明代封赠四品官员的母亲或祖母的称呼。只不过,此碑系1991年所立,据说是因为原碑风化严重,族人们便按原碑式样重刻,只是这样一来,就弄不清原碑是何人何时所立了。不管怎样,我们杜氏家族属外来移民这一点,大概是不会错的。记得幼时父亲曾一再谆谆告诫,要我切记

咱们老家是江西,而非贵州,以后若有人问起,一定要记住我们是“征南”来的,不是“填南”来的。照民间说法,“填南”是充军的罪犯、贱民,只有“征南”才是堂堂正正的“国军”、“正统”,值得引为荣耀和骄傲。照此说来,我该也算个“屯堡人”的后裔了。但我早年随父亲去官旗山上大众坟,印象中,村人们的着装打扮,却全无一丝屯堡模样,或许是变服易俗较早的缘故罢?

多年后,我曾留心查过续修府志,在“氏族志”一条发现述及入黔最早的“老姓”中并无杜姓,唯在分布较广的“大姓”中列有杜姓。进而还发现,明、清两朝的中举名单中亦无任何杜姓中人。想来这杜氏家族世代务农,数百年间竟未出现过什么读书种子,这与“明威将军”的显赫身世未免太不般配。是家道中落?是后辈儿孙不图进取?抑或府志所载不确?皆不得而知。更令人生疑的是,依照家谱世系,杜氏入黔传至我这一代仅十二代,若以二十年为一代计,也不过二百多年,离那洪武征南还差一大截哩。看来,这当中如若不是另有曲隐,那就是什么出了差错。总之,我对那“指挥使”一说实在生疑,不敢轻信。

二

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,因为什么原因,那官旗山的一支人马,便就迁居到了坐落于所谓石人大坡脚下的水洞村。石人大坡又叫各什大坡,是那一带轿子山山脉的主峰,巍峨峻雄,拔地倚天,有如一道高耸的屏障。山顶有一巨石,高约二丈,孤兀突立,仿如人形,乡人呼之为石人。站在山顶,可一望而见到安顺城里的西秀山石塔。山脚下的村子虽说不大,却也有百多户人家。那条

自木当而下的小河，绕过村子流入一侧的山洞里，变作了暗河。“水洞”之名即因此而来。也说不清这杜氏家族在那里居住了多久，忽而有一天，又从那水洞村的同一个朝门里分出一支，迁居到了距之仅两里地的木当，这便是我们木当寨杜氏家族的来历。至于这次迁居的时间和原因，我估计恐怕跟咸同大乱有关。据《续修安顺府志》载，咸同时期，安顺北乡及东北乡一带，所受兵祸最深，荼毒最烈。当其时也，太平军定都南京，天下震动，风卷云涌。贵州境内亦是义旗蜂起，除人们所熟知的张秀眉、红、白号军等等之外，尚有著名不著名者不知凡几。其中，活动在安顺一带的就有岩大五、贺大王、陈小五等。征抚剿平之间，此去彼来，岁无宁日，一拖就是十数年之久。待到战乱过去，已是哀鸿遍野，十室九空，一片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景象了。有续修府志所载为证：

“大姓夷为寒族，大村夷为小寨；甚至有全家灭绝，村寨化为乌有者。如旧志所载之彭家庄、杨家庄、破头山、上补农、下补农、可瓦等寨，今皆已化为乌有。昔之大村今天已夷为小寨者占十之七八，观各村寨之败址颓垣，足可知今昔之盛衰。又如大、小洞口、本寨、腊平、各什、木当、木头、讨兑各寨之赵姓，谢姓，在昔族众甚繁，几占民户十分之六七，今则一村仅数户；狗场、长山之胡姓，潘家庄、杨家庄之潘姓、杨姓，段许庄之段姓、许姓，金家大山之金姓，菖蒲苑之李姓，昔皆大族，今已寥如辰星。民众死于兵者十之二三，死于饥寒、死于疾疫、死于散离逃亡者十之七八。时清廷派员勘察乱象，曾有诗云：躬承简命到黔安，满目饥民不忍看。十里坟添千万冢，一家人哭八九棺。犬衔枯骨筋犹在，鸟啄襟胸血未干。寄与西南君子视，铁石人闻心也寒。阅之酸鼻。”

这段文字不知出于何人之手,令半个多世纪而后的我辈,读来犹悚然动容。值得注意的是,内中恰好也提到了木当。我小时亦曾听说,在我们村子一侧的小河边,有个叫小堰洞的山洞,当年避乱时死了不少人,全是让加上辣椒的烟给熏死的。我的一位胆大的堂兄还说他放牛时钻进去过,里面全是“脑瓜骨”,想来就是咸同之乱遭下的孽了。小小村寨遭此巨创,自难免人烟荒疏,估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,大约在我的曾祖或高祖一辈吧,便于乱后寻机迁到了木当,到我这一代止,恐怕最多不会超过五代,时间恰好也是咸同年间。

三

说来惭愧,我对自己的家世从未留心打问,祖上情况,至曾祖那一代也一无所知。仅知祖父辈共有兄弟四人,祖父行三,名杜文忠,人称三爷爷(我年长的堂兄辈称呼),是个跛脚。也许就因此残疾,四兄弟中,唯一就供了他一人读书。想来是曾祖怜爱,虑其行动不便,难仰务农为生,所以有此眷顾,以成谋生之道罢?祖父后来果以教书为生,是个乡村的私塾先生。他执教的足迹,方圆不出十里,多在邻近村寨,学问想来很一般,无非糊口而已。祖父于何年去世?高寿几何?我一概不知。只记得打从我记事开始,就知道家中一直放着一只有盖的竹筐,里面全是祖父用过的书。不止一次,我怀着好奇,掀开竹筐翻看那些书,虽不识字,却依稀记得全是些用白棉纸刻印的线装书,大约不外乎四书五经之类吧。他老人家的教材教法,包括思想在内,于此可见一斑。可惜这些书后来都被我父亲当作废纸卖掉了。

奇怪的是,祖父以教书为生,而我父亲却一字不识,

是个真正的文盲。印象中,父亲唯一的“文化”是认识钟点,知道几点钟该收摊子。那是在我读小学五、六年级的时候。那时父亲已六十多岁,早已挑不动水卖,便重操旧业,在大十字街头摆了个小小的地摊,卖些日用小杂货,诸如烟袋嘴、小手镯,以及针头线脑之类,所有货物一只提篮便可装下。我常在下午下课后,绕道大十字,帮助父亲收摊子。每逢这时,他总会抬起头,看看大十字中央那架大钟,嘴里咕嘟着,几点了,该收摊子了;或是还早,才几点哩,还要再摆会儿。若时间合适,我便帮父亲一起,将那些物件一一收进提篮,然后拎了篮子,随父亲往家里走去……

据母亲告诉我,我祖父性情温和,待人友善,祖母却有些凶悍。大约我父亲的遗传因子里,祖母的成分要多些。父亲年轻时颇有几分剽悍,不仅胆子大,而且身手敏捷,跑起来差不多能追上一条狗。为此,他早年还犯有一桩命案。

过去那些孤立的小村寨,因势单力薄,常是土匪劫掠的对象。父亲小时,我们那老家就时常遭殃,每逢土匪来抢,村人不敢还击或是还击不力,因此每每得手,不是牵猪拉牛,就是铺笼帐被席卷而去。有一年,已是父亲长大成人的时候,正值土匪夜半来抢,血气方刚的父亲,便与几个同宗兄弟抄起家伙奋力反抗,居然将土匪打退。在追击中,父亲手持铁叉,将一名土匪捅死在田埂上。虽说捅死的是土匪,到底人命关天,而且也不知其中是否有如今法律所言“防卫过当”的问题,所以,事后父亲还是跑到祖父教书的地方避了一阵风头,直到没人追究才敢回村。不过,自此之后,木当寨威风大增,都说杜家几兄弟厉害,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再敢到村里来打劫了。这是父亲年轻时引以为豪的一件事,多年后讲

起,仍有点眉飞色舞,深以自得的样子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父亲扔掉种田的营生而做起小生意来了。这种小生意就是如今仍然时兴的走乡串寨,挑了个货郎担,手持拨浪鼓,走一路摇一阵。那时的乡村,时兴所谓转转场,今日牛场,明日马场,后日猪场,几乎每天都有场期;要赶场期,就得不停地从甲地到乙地,跟着连轴转,称之为赶乡场,这便是典型的“行商”。后来大约有了一些积累,乡场赶得更远了,常到紫云一带去,货郎担也不用挑而换作马驮了。他到得最远的地方,据说是广西的百色。那年头,长途贩运的马帮、货郎,因往来的多是穷乡僻壤,常是土匪打劫的对象,父亲就不止一次遭抢,连钱带物丢个精光,好在每次都捡了条命回来。不管怎样,就靠着父亲的闯荡,家里总算有了点积蓄,所以在我出生之前,便已迁居到了城里。

四

与我父亲常年在外闯荡相反,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十足的家庭的困守者。

母亲姓魏,生于1909年。由于父母去世极早,母亲仅两岁时就被接到她的外婆也即我的外曾祖母家抚养。外曾祖母家住平坝,早年寡居,膝下仅我外婆和她的一个弟弟。他们家原有些田产,大约是外曾祖父去世后被人霸占,直到外婆的弟弟长大成人方打官司要回。但不知何故,这田产却不在平坝而是在距安顺不远的东郊核桃寨,所以,母亲自幼就跟外曾祖母在核桃寨长大。她还有一个哥哥或弟弟,则留在平坝,大约是送了人家吧,因为母亲最小的表弟刘必奇满舅曾告诉我,说他早年(约六十年代初)曾在平坝见过此人,而且很确凿地

说他姓张,但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舅舅。倒是母亲的舅舅也即我们的舅公跟我们很亲很熟。外婆去世后,外曾祖母就舅公这一个儿子,便拼命供他读书。舅公名刘有卓,字梦勤(后以字名),学的是政法,后来果然不负重望,打官司索回了父辈的财产。他曾做到国民政府治下的郎岱县法院院长,1949年后丢了职位,回到安顺,只好到当时的城西民小教书糊口,但为时极短。不幸的是,那份要回的田产划成分时使他成了地主,本人又被定为所谓“历史反革命”,成了低人一等的“四类分子”。可巧他老人家又有一个儿子当兵,是军人家属,所以,每逢过年,街道居委会便来贴上“光荣之家”的春联,反倒更增添了某种讽刺意味,算是光荣与耻辱同在了。似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与难堪,也只有那个阶级斗争“年年讲,月月讲”的年代才会发生。

也不知是什么时候,我的外曾祖母去世,无所依傍的母亲就全靠她的舅父照拂,而母亲也从小小年纪开始,就帮助舅父照看她的那些小表弟、表妹们,以致在我母亲去世之后,其中一位我叫二舅的,曾对我亲口说过,他们应该感谢我母亲的“养育之恩”!此语令我心头为之一震,可以想见母亲对她的这些表弟、表妹怀有多深多重的情感,这当中大约也包含了某种她对舅父养育之恩的感激吧。所以,打从我们出生后,就一直叫舅公作“公公”——而我也一直以为他就是我们的亲外公。公公死于1979年,比我母亲还晚一年。而在此之前两年,外婆已先他而去。两位老人在世时都极善良,慈爱,是我小时随母亲最常走动的亲人。至今犹记小时候在外公外婆家玩耍的情景,转眼之间,竟成隔世,思之泫然。

也许正是这样的身世,铸成了我母亲那多少有点敏感,却又坚忍、倔犟的性格。尽管是从小就跟外婆、舅父

过,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多少总还是有些的罢?所以,母亲一方面能够忍辱负重,但另一方面却也显得敏感、自尊,受不得气——这或许就是通常所说的“骨气”罢?她自立精神极强,即使是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,也从未向那些家境好得多的她的表弟、表妹们开过口,寻求任何物质上的帮助。以致在她辞世之后,一位在紫云县工作的表舅父还来信这样评价她:

“这次你母亲不幸病逝,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可亲的亲人,特别她从小对我的抚养、关怀,我感到十分悲痛。也特别感到她虽艰苦一生,但并不为求得别人的分文施舍而乞灵(怜)、下跪,她一生有骨气。她常常为了家庭,为了顾全大局而忍辱负重;也十分崇敬她这种无私的精神。在她经历过的在世之年,是很多人有负于她,而她无负于人(的)。”

是的,母亲是善良、无私的。她待人谦和,讲究礼数,总是为别人想得多而为自己想得少。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,尽管早年家里十分拮据,但每逢那些工作在外的表舅、表姨回家探亲,母亲想方设法总要将他们请来招待一番,为此哪怕挪挪借借也在所不惜……

母亲大约十七、八岁就已出嫁,十九岁时生下了我的大哥;夫家姓刘,是距木当寨不远的猫猫洞村人,很早就去世了,这才又改嫁了我父亲,其时,我那位同母异父的大哥才两岁多一点。后来,母亲先后生下我的大姐园珍、二哥发生,不幸这两个孩子都早夭了。再后来生了二姐琴珍(后自取名燕),乳名“招弟”,不想招来的是我三姐,在我出生后不久,这位三姐也夭亡了。这样,母亲共生下我们兄妹六人,结果存活的只有一半。

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女性一样,母亲是没有名字的,早先的户口簿上,母亲的姓名写作“杜魏氏”,后来

母亲告诉我,她其实是有名字的,她的名字叫“魏正元”,并为此还专门去刻了个印章,可惜不大派得上用场。跟我父亲一样,母亲也是一字不识,但她的记性却极好,能够整段整段地背诵那些在乡间广为流传的民间唱词,诸如什么《蟒蛇记》、《水打兰桥》之类。我童年的许多夜晚,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,常常就是伴着母亲那长声悠悠,时起时伏的吟唱,渐渐进入梦乡的。在我的印象中,这似乎是母亲唯一的爱好了,她对这类说唱性质的民间传说似乎特别着迷,直到她的晚年——大约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吧,有一次,我的一位侄女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川剧唱本《柳荫记》,母亲如获至宝,每到晚间便让我侄女给她一段一段地念。直到她去世,我们清理遗物时发现,这本1954年出版的旧书,仍用手帕包得好好的,放在她的枕下……



我的老家木当寨